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4.006

# 组织部又来了个年轻人 ——重读《沧浪之水》

沈建阳

(集美大学 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沧浪之水》讲述的是一个“组织部又来了个年轻人”的故事,是对这一主题的续写和改编,也是对“年轻人”和“人”的又一次重新想象。同时,《沧浪之水》是在“新写实”之后现实主义创作的又一次尝试,它在再一次充分地释放现实主义能量的同时,也同样受到了这一写作方式的限制。这一限制既体现在小说的创作当中,也体现在批评家的批评文本里。

**关键词:**《沧浪之水》; 年轻人; 现实主义; 知识分子; 官场小说; 成长小说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4-0049-06

**引用格式:** 沈建阳. 组织部又来了个年轻人: 重读《沧浪之水》[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4): 49-54.

##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Has Another Young Man: Reading *The Water of the Waves*

SHEN Jiany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history, *The Water of The Waves* tells the story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has another young man”. It is not only a continuation and adaptation of this theme, but also a re-imagination of “young person” and “person”. At the same time, *The Water of The Waves* is another attempt of realism creation after “new realism”. It is limited by this writing style while fully releasing the realist energy. This limitation is reflected both in the creation of the novel as well as critical text of the critics.

**Keywords:** *The Water of the Waves*; young man; realism; intellectuals; officialdom novels; growth novels

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自2001年发表以来,几经再版,“一版又一版再版了70多次,发行量近百万册”<sup>[1]</sup>。它既是一本名副其实的“畅销书”,同时也是一本“长销书”——在2015年接受中国

新闻网的采访中,阎真本人也透露,《沧浪之水》从“刚出版到现在发行量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一年印四到五版,每版一万册”<sup>[2]</sup>,并且先后斩获了《当代》杂志“文学拉力赛”总决赛冠军奖、《小

收稿日期: 2019-05-25

作者简介: 沈建阳(1988—),男,福建建阳人,集美大学教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说选刊》杂志社“仰韶杯”优秀小说奖和湖南省“毛泽东文学奖”“中国公众文学奖”等奖项。

据阎真自己说,《沧浪之水》想要探究的是历史转型时期、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境况——年轻的大学生池大为从医药学研究生毕业以后进入省卫生厅机关工作,从一名清高、莽撞的青年学生逐渐演变成为一名老谋深算的现代官僚。这既是池大为一个人的“发迹史”,展示的是他从无职无权、空怀壮志,到“时来运转”“大展宏图”的全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人”的“溃败史”,在历经了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尝遍了升迁途中的世态炎凉之后,池大为逐渐放弃了自己曾经坚持的“人文理想”,完成了最后的蜕变。

《沧浪之水》其实讲述的是又一个“组织部新来了个年轻人”的故事,同时也是对这一故事的续写和改编。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在阎真的《沧浪之水》和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之间还隔着“新写实小说家”刘震云等人的创作,比如刘震云的《单位》和《一地鸡毛》。也就是说,这是在“新写实”之后“现实主义”创作的又一次尝试,也是对“年轻人”和“人”的又一次重新想象。在充分地释放“现实主义”能量的同时,《沧浪之水》的写作也同样受到了这一写作方式的限制,这一限制既体现在小说的创作当中,也体现在批评家的批评文本里。

## 一 为当代知识分子写心

《沧浪之水》写的是青年池大为在官场里的沉浮,它以近乎残酷的写实笔法,让一个原本无意为官的年轻人一边深刻地质疑、批判自己,一边又对权力趋之若鹜。他最终以“不能示人”的手段谋得高位,在人生和事业获得“成功”的同时,却又饱受心灵的折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杂志“文学拉力赛”的评委认为“《沧浪之水》是一部标准的官场小说”<sup>[3]</sup>。类似地,评论家钟友循在《试论〈沧浪之水〉及其接受效应》一文中指出,《沧浪之水》是一部具有“浓郁的湖湘地域文化风情”的“湘味官场小说”,而且在钟有循看来,池大为根本算不上是“知识分子”,“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官场知识分子’”。<sup>[4]</sup>在这一类批评当中,批评家其实更多关注的是小说的后半段,他们的关注点落在“官场”上,聚焦

于权力如何迫使一个年轻人蜕变、变形,残酷地“杀死过去的自己”,继而走向精神的沉沦的过程。

在更多的讨论中,《沧浪之水》被视作一部“知识分子小说”。相应地,在这些论述中,批评家关注的重点落在主人公池大为身上,他身上“知识分子”的这一面被更多地凸显出来。相应地,池大为事业上的“成功”和精神上的“颓败”也就被阐释为“在金钱和权力面前,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失去的悲剧”<sup>[5]</sup>,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挽歌”和“神曲”。小说也被看作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是“知识者精神的守望和自救”,认为它写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sup>[6]</sup>这一类批评关注更多的是小说的前半段,聚焦于“知识分子”池大为如何在强大的生活逻辑——金钱和权力面前,节节败退,甘心情愿地放弃自己一度坚守的“人文精神传统”,最后完全被社会“同化”的过程,而这“蜕变”的过程其实在小说的前半段已经完成,后半段更多描述的是池大为如何一步一步地玩弄手段,去获取自己事业上的“成功”。

与前两类评论的简洁明快相比,评论家雷达的态度就显得有些“犹疑”,他一方面指出小说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所察觉却又朦胧莫辨的某些东西给挑明了”,让人简直有种“天机被泄露的感觉”,作品发人之所未发,“特别是对官本位文化的实际威力及其渗透程度,对权力崇拜的危害,可谓鞭辟入理。”但在接下来的行文当中,雷达很快又指出小说在“写出当下日常生活中的变异和扭曲的过程”以及塑造“形象的丰满度和生动性”这两个方面,又“超出了一般官场小说的格局”。<sup>[7]</sup>也就是说,在雷达看来,《沧浪之水》在格局上超出一般的“官场小说”,虽然仍然在“官场小说”层面上讨论《沧浪之水》,但他并没有明确地把它归类为“官场小说”——这是一个“犹疑”的甚至可以说有些“分裂”的态度,或者说,雷达的“犹疑”本身也是《沧浪之水》本身的“犹疑”。

阎真本人就不认同《沧浪之水》是一部“官场小说”的说法,在他的创作谈当中,他和雷达一样,对“官场小说”或“反腐小说”这一创作类型本身也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在很多有名的小说和电视剧中,人们总是看到其中有两类人,好人和坏人,腐败分子和清官。

我对这种人物关系的构筑，越来越感到不满，感到其中的浅薄，甚至感到厌恶……把公正的希望寄托于良知，清官，总不太牢靠，以圣人的标准要求每一个进入权力的人，那是一个神话。我们在神话中生活得太久了，还不知道到哪年哪月才能走出来，成为现代人。<sup>[8]</sup>

在他关于这一小说更多的创作谈和访谈当中，阎真则毫无掩饰自己的“现实主义”的写作立场，他要像一个“时代的书记官”一样去见证和记录自己的时代，他多次强调自己所要表现的是“时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

也许未来的思想史学者会对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境况予以特殊的关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历史转型至今仍在延续，历史转型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精神裂变，则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基本定型……对这一过程予以具有历史眼光的理论透析可能为时过早，但感性化的描述则已经成为可能。

这就是我写作《沧浪之水》的基本想法。<sup>[9]</sup>

也就是说，阎真的关注点完全在“知识分子”身上，雷达和批评家们所看重的池大为在官场上的遭遇不过是他用来表现这一“同化”和“崩溃”过程的舞台或者说道具。相应地，对于“权力”，阎真也有完全不同于以上批评家的认识，在小说当中，他借池大为之口，道出了自己对“权力”的理解：

我是凡人，我有欲望，我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无欲则刚，我刚了这么多年，落到如此地步不说，看不见牺牲的意义更是使人沮丧以至绝望。我必须紧急启动奋起直追……公事公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个人化的时代也改变了权力的存在方式。

权力就是有这么神秘的力量。权力左右着资源分配，谁敢说自已无需在分配中得到照应吗？照应不照应，天上人间。<sup>[10]2-3</sup>

类似的，在创作谈中，他再一次地谈到自己的“权力观”——

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内心是渴望着一一种承担的机会的。承担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自我证实的需要，还是拓展自我生存空间的途径。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他有权力的渴望，是正常的，有权力才有更多的承担，才有干点什么的机会。……有人认为，所有进入

权力的人都纯粹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我并不这样想。说这个话的人并不是充分了解知识分子的内心。<sup>[8]</sup>

在小说的前半段，池大为是一个清高的旧式“知识分子”。在小说的开篇，池大为回乡为父亲池永昶奔丧，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本民国二十八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的小册子，作者也正是通过这一小册子中的孔子、孟子、屈原、谭嗣同等十二位先贤赋予了池大为“克己复礼，万世师表”“舍生取义，信善性善”“忠而见逐，情何以堪”“肩承社稷，肝胆昆仑”等精神内核。上述先贤无疑是池大为心目中的“文化英雄”——“我翻看着这些画像，血一股一股地往头上涌，浑身筛糠般地颤抖。那种朦胧而强烈的感情冲击着，我自己也无法给予确切的说明。”<sup>[10]276</sup>上至孔子下至谭嗣同，池大为所谓的“文化英雄”其实多为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名人，借助这个被发明出来的“传统”，阎真要将池大为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来表现他们在历史转型时期的精神境况，借此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市场经济”和由它导致的“相对主义”，并由此提炼出“知识分子之死”的命题。

由此可见，在将池大为定义为“知识分子”并进而将其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的过程中，其实存在着意义的两次跳跃。正如有批评家指出的，“池大为虽然出身低微，但淳朴的文化血缘和独善其身的自我设定，是他希望固守的‘中式’的精神园林。这一情怀从本质上说不仅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与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相去甚远，而且这种试图保持内心幽静的士大夫式的心态，本身是否健康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它仍然是一种对旧文化的依附关系。”<sup>[11]59</sup>更有批评家不无尖刻地指出，池大为“他不太像当代年轻知识分子，倒像是在‘天地君亲师’时代进京赶考的秀才郎”<sup>[3]206</sup>。这两次“跳跃”导致的错位，也就使得池大为凭借传统的人文精神来与世俗所做的抗争，有点唐吉珂德大战风车的味道，显得苍白而无力。

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权力”观念让池大为这一人物形象处于两难的境地。池大为“当代知识分子”身份上的含混，也直接导致了批评家对



池大为转变动机的质疑。在小说中,池大为出于对“权力”的渴望和认同,且不论在小说的后半部中“他成功地杀死了曾经的自己”后,在仕途上一马平川、大展宏图;就是在小说的上部,正如有批评家指出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池大为“在本质上,他有着与他人一样的物质欲望,从日常生活细部的察言观色到对权力、等级的敏感和窥视,他都丝毫不亚于被他视为猪人、狗人的丁小槐之流。马厅长的礼遇和冷落,同样是他情绪心理的晴雨表”<sup>[12]42</sup>。如此来看,市场经济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其实并不构成池大为转变的真正原因(他更多的是在寻求“自我认同”)。而《沧浪之水》本身又以逼真的写实见长,它几乎完整地再现了“知识分子”池大为的“蜕变”历程。这就不仅使得批评家们对所谓“权力”和“官本位”文化的批判扑了空,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作品批判性的丧失——池大为的“蜕变”看起来更像是自然而然的演化过程,引得批评家对这种“劝百讽一”写作方式的深深不满,在他们看来,作者本人对主人公给予了过分的体谅和同情,又为他的堕落提供了太多的理由——

池大为一边自甘堕落,一边还以虚幻的集体名义为依托振振有词地述说理由。整部《沧浪之水》就以池大为过足了堕落之“瘾”后的回乡祭父作结尾,在坟前他有大段大段被“逼良为娼”式的沉痛无奈却又无辜的道白……池大为就变得既尽可享受堕落带来的物质利益,又不必为此承受任何个人良知上的负疚了。作者也放弃了对池大为的人格批判,而以知识分子名分,作了池大为堕落的遮羞布。<sup>[12]42</sup>

类似的批评虽然多少有点诛心之论的味道,但并非没有道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使得小说变成了上下两截,前半截写的是“知识分子”的故事,而后半截是“官场小说”。这其实既是雷达在评论小说“犹疑”的原因,也是阎真本人在写作时感到“无法抑制内心的悲凉”的原因。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其实也是一个“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故事,是对这一故事的续写和改编,但是在王蒙和阎真之间,其实还有刘震云等“新写实主义”小说家的创作,也就是说,阎真是要在“新写实小说”的“一地鸡毛”之后来重启一种带“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写作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

就导致了《沧浪之水》写作的困难。

## 二 “组织部又来了个年轻人”

在批评家李建军看来,《沧浪之水》既不是“官场小说”,也不是“知识分子”小说,而是一部关于“青年人的成长小说”:

人在年轻的时候,大都做过五彩缤纷的梦,大都有一股雄心勃勃舍我其谁的英风猛气,最终,却不得不在深长的叹息声中,向生活低下高傲的头颅,事事都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倾向于接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之类的“差不多”哲学。这种从高昂到低沉,从热烈到冷漠,从进取到退守,从自信到自馁的下滑沉落过程,乃是具有原型意义的个体生命图式。<sup>[13]43</sup>

在李建军看来,《沧浪之水》的主题是由巴尔扎克的《幻灭》开启的,并被西方文学中的《堂吉珂德》《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德伯家的苔丝》和中国文学中的《红楼梦》《阿Q正传》等小说继承的“幻灭”主题。它讲述的是一个“人的生存境遇和幻灭历程”的故事,这其实也是根据这一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岁月》的开场白。这种解读方式虽然征引的大都是“现实主义”的经典文本,同时也将小说的背景落实在“固有的价值体系失去效力,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形成”的“九十年代”,但在具体的解读过程中他还是把这一主题普泛化了,或者说“现代主义”化了,之前评论中属于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在市场经济下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泛化为现代社会中人类的一般经验——“从池大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类似于歌德时代德国社会的生活情状”,“池大为们与巴尔扎克等十九世纪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属于同一精神谱系”<sup>[13]45</sup>。

类似的,在批评家孟繁华看来,这部小说最值得讨论的部分在于它“反映出的当下社会承认的政治和尊严的危机”<sup>[11]59</sup>。在小说中,池大为的人生看似有很多种选择——他可以选择像单位里的“闲人”晏之鹤一样置身于权力斗争之外,得清闲自在;也可以向马垂章看齐,隐忍不发,见风使舵,全身心投入到对权力的角逐之中去大展宏图;或者向同学胡一兵、妹夫胡志强一样拥抱市场经济,“变成一只狼”,“下海”去经商逐利。某种意义上,池大为“弃善从恶”“弃明投暗”,

未能自始至终坚持“知识分子”的立场，正是批评家们对这部作品展开激烈批评的原因。但是在实际上，池大为的选择十分逼仄——“池大为坚持的困难并不仅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他与‘他者’的对话过程”<sup>[11]59</sup>，也就是说池大为的“知识分子”身份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他的身份来自于与“他者”的对话和互动过程中，或者说是在“人与人在对话中的被左右与强迫认同”<sup>[11]59</sup>：

于是，小说提出的问题就不仅仅限于作为符号的池大为的心路历程和生存观念的改变，事实上，它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在于概括了已经被我们感知却无从体验的社会普遍存在的生活政治，也就是“承认的政治”。<sup>[11]59</sup>

批评家孟繁华在阅读《沧浪之水》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恐慌感”，或许就是阎真在创作谈中提到的“宿命化的同化力量”。在阎真的论述中，池大为也不是“贪官”“腐败分子”，他就是历史转型期的“典型人物”，是处于市场经济和在市场经济下衍生的“相对主义”情境下的当代“知识分子”，他的写作就是要“为当代知识分子写心”：

我力图写出普通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那种宿命性的同化力量，它以合情合理不动声色的强制性，逼使每一个人就范，使他们失去知识分子的身份，变成一个个仅仅活着的个体，虚无主义者。我理解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他们都有非如此不可的充分理由。在市场的高歌猛进中，我看到了一种无处不在的逆向过程，一种遮遮掩掩甚至无需遮掩的溃败。这种溃败在每一个角落发生。一方面是责任、人格、心灵的理由和信仰的渴望，另一方面是功利、名望、生存的需要和虚无主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巨大的价值悖论。<sup>[8]2</sup>

在每一角落都在发生的“溃败”所导致的“虚无主义”和“巨大的价值悖论”，既是阎真对当下“知识分子”困境的体察，类似的见解也见于阎真在《新写实：意义的重构》一文中对“新写实”这一文学潮流的批评当中：

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是从展开着的市场经济进程中生长出来的，是社会转型历史时期理想主义式微，乌托邦幻灭的社会普遍情绪在作家笔下的表现。作为一个文学潮流，新写实小说的本质是意义的重构，即将意义的定位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社会政治到世俗人生。其艺术特

征如叙述上的中立态度和非典型化方法等，都是服从于这一目标的。<sup>[14]</sup>

在阎真看来，“新写实”的意义在于其价值论方面的“不动声色的解构性”，它借市场经济的强势逻辑宣告了形而上的意义和价值的无效性，使意义和价值回到形而下，回到日常生活，回到生存现实当中。与此相伴随的是新的叙述方式的产生，比如退出评价的中立的叙述态度，放弃典型化原则等一系列新艺术方法。

同样是对于新环境的体认，阎真和批评家李建军、孟繁华等人的差别在于他对“知识分子”这一身份的强调上。其实正是这种对“知识分子”（启蒙）身份的强调，正是一方面坚持“现实主义”立场，另一方面又对“新写实”的现实处境有着清醒的体认，使得批评处于两难的境地，也让阎真的写作处于某种紧张之中。这种紧张表现在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要时刻跳出来为小说中的人物说话，或者通过议论修正他们的态度，或者直接道出他们内心的想法，把他们导引到自己设置好的路途上去。这其实也就是李建军在《没有装进银盘的金橘——评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一文当中指出的小说的“不成熟的讽刺和过度化议论”以及“作者要了人物的命”两点缺点。在李建军看来，在《沧浪之水》的写作中，作者的“主观态度过于显豁，情感过于外露”，这直接导致了“用力太过，渲染失度”的毛病。而在随意的独白式议论当中，看不到节制和含蓄，也看不到精辟和深刻，这些议论片面、浮泛，对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缺乏关照，也缺乏同情之理解，“迹近詈骂的刻薄和怨天尤人式的尖酸”反而让人觉得不真实。同时，作者的形象过分膨胀，也挤压了人物的生态空间。因为这部小说具有写实性质的单一视角，作者将自己的气质、性格和价值观念强加在池大为身上，同时也部分地注入到部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言谈当中，这就直接导致了所有人物都用同样的口气说话，尽管设置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到头来，说话的实际上只有作者一人。<sup>[13]43</sup>

类似的“缺点”在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比如在同样是“现实主义”作家的路遥的作品中，也同样存在“议论过多且作者过于强势”的问题，而这种看似稚拙的写作“问题”，本身确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题中之意，正如有论者指出的：

路遥通过这种“重新到位”的方式努力把其所要书写的对象环境、人物、时代与作为个体的“写作者”统一起来,作者不仅要写,更重要的是,要像自己写的那样去“生活”。这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伦理最本质的内涵,作者的写作并非为了确立一个“自我”的存在和“美学观念”,而是为了通过文字这种实践行为,把个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身份认同都统一到一个更高的“整体”中。<sup>[15]</sup>

从这个角度来看,路遥可能也是“最后一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义上的经典作家,他的写作也是作为“制度”的“现实主义”在中国最后一次扎实的实践,而与此相伴的客观条件——即所谓的“道德、政治、美学的三位一体”,确实是阎真写作《沧浪之水》时不可能具备的。

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结尾,林震“隔着窗子,他看见绿色的台灯和夜间办公的区委书记的高大侧影,他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了领导同志办公室的大门”<sup>[16]</sup>。而在《沧浪之水》的结尾,后来的“年轻人”池大为回乡扫墓,在父亲的坟前把他那本珍爱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付之一炬,他再一次仰望星空,“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暖流从心间流过,我无法对它做出一种准确的描述……在风的上面,群星闪烁,深不可测”<sup>[10]523</sup>。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沧浪之水》既是对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续写,也是对它的改编。池大为和林震其实处于一个人物谱系之中,但他当然不是林震,也不可能再和林震一样。在他们之间,其实还隔着“新写实小说”,而在“新写实”小说家刘震云等人的作品中,在主人公小林对自己从学校进入社会的一段人生经历的回顾中,“青年人”已经完成了向“年轻人”的转变——

两人都是大学生,谁也不是没有事业心,大家都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机关,都不在眼里,哪里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到黑压压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呢?……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sup>[17]</sup>

如果说,“青年人”意味着蓬勃的朝气和摧枯拉朽、改天换地的豪情,而“年轻人”则更多强调的是年轻人身上幼稚和不成熟的一面。某种意义上,《沧浪之水》的困境就源自于它试图通过一个“年轻人”的遭遇再去讲述一个关于“青年人”的故事,让沉湎在“日常生活”中的“年轻人”再一次像“青年人”一样去“仰望星空”。或者说,作家阎真再一次启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在释放出这一话语巨大的能量的同时,也受到了这一话语的限制。可以说,小说的成败均系于此。

#### 参考文献:

- [1] 高玉涛.好人阎真[J].中关村,2017(7):93.
- [2] 王晓易.专访作家阎真:余秀华的诗在艺术上“无炒作空间”[EB/OL].[2019-05-25].<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5/0121/c172318-26426448.html>.
- [3] 王石语.文学拉力赛评语[J].当代,2002(1):205.
- [4] 钟友循.试论《沧浪之水》及其接受效应[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53.
- [5] 余三定.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失落的悲剧: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J].云梦学刊,2003,24(2):22.
- [6] 齐成民.当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沧浪之水》读后[N].中国文化报,2001-12-20(3).
- [7] 雷达.阎真的《沧浪之水》[J].小说评论,2001(5):7-9.
- [8] 阎真.为当代知识分子写心:《沧浪之水》随想[N].文艺报,2001-12-11(2).
- [9] 阎真.时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说说《沧浪之水》[J].理论与创作,2004(1):52.
- [10] 阎真.沧浪之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 [11] 孟繁华.尊严的危机与“贱民的恐慌”:评阎真的《沧浪之水》[J].理论与创作,2004(1).
- [12] 陈立群,马兴华.堕落:在整体名分和个体真实之间[J].作品与争鸣,2002(6).
- [13] 李建军.没有装进银盘的金橘:评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J].小说评论,2001(6).
- [14] 阎真.新写实:意义的重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34(5):100.
- [15] 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J].南方文坛,2007(6):73.
- [16] 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44.
- [17] 刘震云.一地鸡毛[M]//刘震云.刘震云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156-157.

责任编辑:黄声波